

北京同仁堂名藥

傅杰



新平知覺

PDG

北京同仁堂名药

北京中医药老年保健研究所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

三河县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14插页

印数：000001—15000册

198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4249·0159 定价：3.60元

新学社

PDG

北京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





都內藥鋪屬同仁丸
 散人之道通真微有
 岐黃經列味笑他為個
 術通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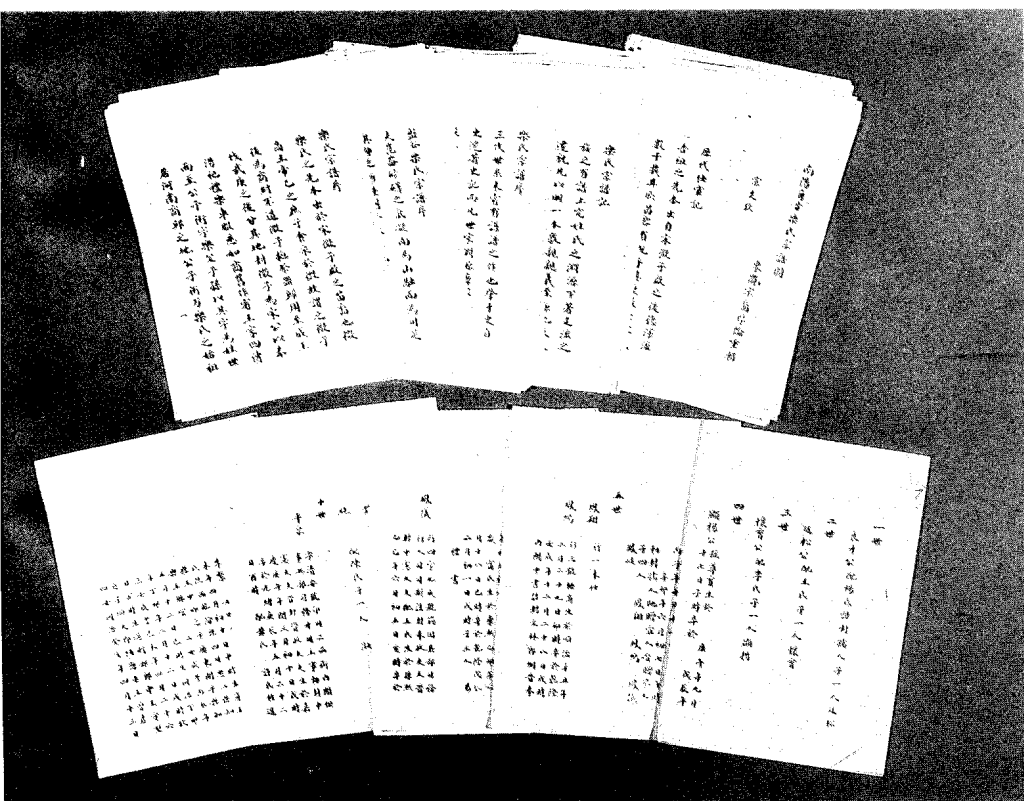
壬戌年值

同仁堂創立三百一十三年

清人詩句致賀 王寅蘭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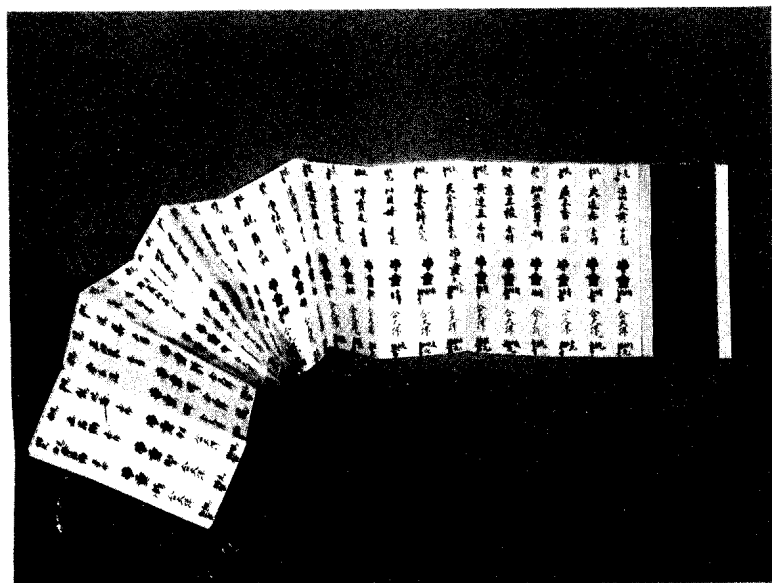


北京同仁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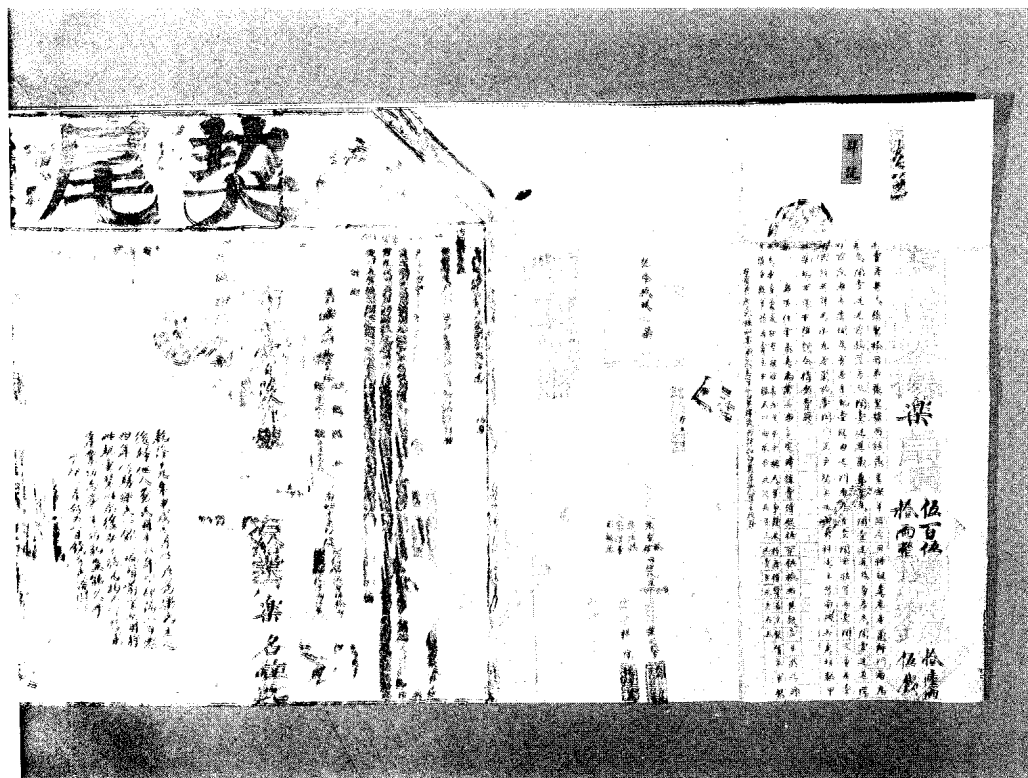
乐氏家谱包括：乐氏宗谱序、盘谷乐氏宗谱序、乐氏宗谱记、历代仕官记、南阳角音乐氏宗谱图，图为乐氏一世至十世的生平概述。

北京同仁堂



同仁堂药目

北京同仁堂



同仁堂产业契书：上有镜字在丁卯年六月题词：
“乾隆十九年甲戌七月，此房为乐氏主，之后归他人
至民国十六年丁卯，隔二百零四年仍归乐氏”。

序

当前世界由于环境污染、空气污染，使人望而生畏，病患者更为恐惧，同时因社会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其它种种因素，导致的各种疾病，现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良好办法来解决这些疾病，纷纷向中国来寻求中医中药的治病方法。众所周知，中医是从宏观的、辩证的治病求其本的办法来治疗疾病，使用中药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手段，由于它具有作用缓和、持久、疗效稳定、无副作用等特点，深受广大病家的欢迎。而中药的加工炮制又是一门极其独特的科学，依法炮制对药效有重大关系。一味药物或一种成药，其疗效的高低，除原料药材本身的品种质量（地道药材）外，炮制加工是否得法，有决定性的作用。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中的佼佼者。其创办于清康熙七年，至今已有三百一十五年的历史，一度曾供奉皇宫御药房用药，该堂先后吸收古代名方和民间验方以及收入大量的宫廷秘方，因此，同仁堂的名药集中药荟萃之大成，它以历史悠久，配方严谨，原料上乘，疗效显著，享有盛名。不仅国内妇孺皆知，而且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亦知其名，并享有很高的信誉，因而信赖同仁堂名药。

现在同仁堂名药已成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保健的良药，但病患者，如何了解其各种药品的功效，及其特点等，至今尚无一本这方面较系统的著作。

现在见到崔树德等同志编写的《北京同仁堂名药》一书，弥补了这一不足，这对广泛宣传同仁堂的名药作用，以便更好地发

挥其优势是非常必要的。展读之下，此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取材新颖、图文并茂、切合实用，很有价值。现特向读者推荐，愿其作为患病者的服药指南，医生临床用药参考，并可作为家庭必备的“医药顾问”。

吕炳奎

乙丑年端阳后三日

主 编

崔 树 德

副主编

张 炳 鑫

王 学 治

编 者

薛 辉

翁 维 健

王 斌 考

程 孝

顾 问

萧 启 堉

谢 海 洲

杨 光

冉 小 峰

乐 守 玉

编 者 的 话

北京同仁堂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创办于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该店创始人乐尊育曾是行医卖药的“郎中”，后任清皇宫太医院吏目，精研医药，致力于提高中药丸、散、膏、丹和药酒的质量，以配方独特、原料上乘、加工精细、疗效显著，而享有盛誉，并经世不衰。

中药是中华民族国粹，为继承和发扬同仁堂的精华和优势，开创中药新局面，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我们编写了《北京同仁堂名药》一书。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同仁堂的历史，同仁堂的名贵中成药和名贵中药材，其中对药品的功能、效用等作了较详尽的分析介绍，对重点历史见证和重点药品配有彩色插图。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贾志辉同志、北京市卫生局郑勇同志、北京市医药总公司王亚曙同志、田成茂同志、北京药材公司李培松同志、北京同仁堂制药厂郭洪年同志以及祁肇修、刘久和、张德培、李予夫、张恕宏、王学忠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原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理事长吕奎炳同志作序，原清宫亲王爱新觉罗·溥杰为本书题写书名，著名书法家萧劳书写清代诗人赞颂同仁堂的诗句，特在此一并致谢。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同 仁 堂 简 史

北京同仁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声誉卓著,驰名中外。始创建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至今已有三百一十五年的历史。同仁堂药铺是乐姓创办的,并且世代相承,故又称“乐家老铺”。

同仁堂继承了祖国几千年的医药科学遗产,积累了中医药学家们的丰富经验,它所制造的丸、散、膏、丹疗效卓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同仁堂”的名字家喻户晓,声蜚中外。清朝诗人就曾写诗赞道:“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岐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

现代医学家沈其震有诗赞道:“同仁,乐家药肇,广集验方,安志怀少;三百一十五年,箕裘克绍;起死回生,功潦亿兆;益寿延年,惠及海表;遐迩风闻,国之瑰宝”。国际友人著名医学家马海德赞道:“同仁堂用祖国传统医药为中国人民健康服务三百一十五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应载入中国医药学的里程碑”。

兹将同仁堂的历史、盛衰、经营、及其发展、沿革,梗概地叙述于后。

创办同仁堂的乐姓原籍是浙江省宁波人,明朝永乐年间,迁居北京,素以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为业,其四世祖乐尊育(1630~1688年)喜读方书,心存济世。清代康熙年间,曾任太医院吏目,其五世乐祖梧同乡试落第,乃继承先人遗志,于康熙四十年(1702年)在大柵栏开设了同仁堂药室。同仁堂药目中有乐梧罔于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6年）撰写的一篇序言，有下列一段话：

“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号尊育，为太医院吏目，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喜阅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尝语人曰，古方无不效之理，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用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每庭训之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云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予业举子碌碌三十余年，先君之训，几忘之矣。壬午乡试毕后，闲居无事，追忆昔年遗训，翻得勃然鼓舞而为之，遂立同仁堂药室焉。汲汲济世，兢兢小心，虽不能承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也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观其自序，证诸解放前在该店工作过的人，亦津津乐道同仁堂用药必讲地道，工艺一丝不苟的传统，益信其序，不是欺世盗名、虚伪自夸之辞，故能历几百年之久而不衰，这决不是侥幸所能得来的。

关于同仁堂的创办年代，各记载中略有出入，根据最早的药目叙言中说，为康熙四十年壬午（公元1702年）。为什么前面叙述为康熙七年己酉（公元1669年）呢？是根据同仁堂收藏一块康熙己酉年的老匾而来，那块老匾可推测为其四世祖乐尊育开始制药问世时所立，其地址不可考。其五世乐梧冈在三十年之后，才在正阳门外大栅栏正式开设同仁堂。

同仁堂开业后，由于管理有方，用料讲究，炮制如法，疗效卓著，于是深受广大群众信仰，并博得皇宫的清睐。在雍正年间（1723年左右），开始供应御药房，也正因为如此，而享受了封建特权，第一次即预领官银四万两，如此经济往来，历代未断，当然资金与销售都相应扩大，帝制度融，改建民国，才告终止。如此几百年间，不仅是经济上受益优渥，在政治上更得到很

大扶持，例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同仁堂曾经失火，损失极重，遭此天灾之后，景况日下，负债累累，已到无法维持的地步，由于皇室的需要，特派内务府官员督办官银官药，弹压私债，不得搅扰，后又经提督府出示招商，由张姓接办，官银、客帐、私债准许十年后等销，并承办官药，从此同仁堂就不是乐家独有，系合股经营，并屡易其主，但其牌匾始终属于乐姓。由于同仁堂承办官药的需要，持有御赐出入皇宫的证件“腰牌”，并能借皇上圣旨到全国各地采办官药，在各种原料的选择标准，以及运输方面，打着皇旗享受着特殊的优待，畅通无阻，每年春秋两季派人去广西、河北等地采购药材。药材市场必须先经同仁堂选择上品后，才能开出牌价，谓之规定牌价。从乾隆十八年到其曾祖乐印川在道光二十三年恢复祖业为止的百余年中，同仁堂虽迭经变故，但始终不倒“金字招牌”，这和清皇室的提携维护是分不开的。

1831年乐印川（名平泉、字清印）已为祖业继承人，当时同仁堂已典在朱姓手中，他虽有恢复祖业的雄心，由于经济力量薄弱，无力赎回自理，嗣因朱姓经营不善，赔款潜逃，于是乐印川与朱姓人商定，将铺业收归己有，但仍不自行经营，又典与庆姓，1837年，又租给慎有堂张姓及董启泰两家，乐家每月到铺取租京钱五千文，自己另开设广仁堂药室与同仁堂相抗衡。越二年，1839年，张姓病故，董启泰感到独立难支，又受广仁药室的排挤，经亲朋说合，与乐印川订约，将广仁药室关闭，所有货物全部作价倒给同仁堂，价银一年内还清，惟保留部分成药如再造丸、七厘散等十余种，仍由乐印川自行配制归同仁堂寄卖，而同仁堂不得添配这些品种，这些品种，规定销售金额之六成，于次月初归交乐印川，他用这种寄卖丸药的方法，积累了相当的资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生意萧条，日益亏本，董姓在承

租时，亏银八万五百四十两，四年时间，又新亏三千八百五十六两，因而不能支持，遂立推还契约，并立欠票一纸，以陆续归还，从此由乐印川全部接收，亲自经营。

乐印川接管同仁堂后，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经营管理制度，凡配制贵重成药，必亲自监督，购买贵重和大量药材也亲自经手，既不用资方代理人，也不采用学徒工，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裹金、包药工作。在他接管的同时接收了很大数字的债务，由于他精明强干，注重信用，在药源上得到北京四大药行（天汇、天成、隆盛、汇丰）和有名经营麝香的杜盛兴等大力支持，有先用货后付款之便，药店有了充足的货源，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同仁堂的东山再起，和他的传统方法，也有一定的联系。处在封建落后时代，宣传方法没有现代的方便和高明，而他能采用朴素的深入人心的方法，做到广为招徕。如过去北京城内每年要挖掘清理城沟一次，需费时一月，他即在城门明显的地方，设立沟灯，每当夜晚，用红色写着“同仁堂”三字的大灯笼照耀着沟渠和行道，确给行路极大的方便，也收到宣传的效果。每逢会试的时候，他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学子，赠时令药品，所费无多，宣传效果则很大，并且使同仁堂的药得以推销到全国各地。同时也举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在冬季设粥厂，夏天送暑药，兴办义学，虽不无宣传的用心，但比较之于那些富而不仁者，真有天壤之别。此外，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药王生日”时，同仁堂大宴宾客，请名角唱戏等，大作广告宣传。因此同仁堂的名字，深入到各个阶层，在乐印川一生的锐意经营下，情况大为改观，才得将外股全部收回，清还了全部债务，营业日益兴隆，声誉远近昭著，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咸丰四年（1854年）乐印川捐了四品官衔，光绪四年（1878年）他又得到二品典封，虽不是实

职，但有了顶带花翎也就更为声势显赫，而有利于同仁堂的经营。多年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同仁堂滋生出来乐家老铺的分号有三、四十家之多，遍于南北各省，但同仁堂只有北京一家。

乐印川有子四人，名孟繁、仲繁、叔繁、季繁，后称为四大房。他于光绪六年（1880年）逝世，乃由乐松生的曾祖母许氏主持家事与店务，事无巨细，都亲自操持，精于世道，善于用人。如职工的三餐，也关心过目，会计前来交帐，他必亲自迎送。在他的主持下，四大房均相安无事，同仁堂的事业也得到继续发展。清光绪庚子年间（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她率领全家避难于太原，同仁堂业务由查柜（高级职员）刘辅庭代为照管，在此期间，曾又遭受火灾，烧去铺面前庭，加之法美侵略军的蹂躏，营业被骚扰不堪，次年，她率领全家返京后，其二祖乐仲繁协同分管内外，从事整顿工作，同仁堂才恢复了旧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曾祖母去世后，由其二伯独揽店务，暗中贪污，从此四大房对于管理大权及经济问题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决定了四房共管制度，每年从店中提出四万两银子，平分给四房，分三节支付，不再分红，各家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设分号，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字号。四大房虽然议定了共管制度，实际上是采用轮流作庄方法，各有蓄谋肥己，或者寄卖所谓秘方丸药，如加料牛黄清心丸等等，或借掌权之便，在帐本上巧立名目，盗卖商品等手段，中饱私囊。另开乐家分号，如达仁堂、宏仁堂、永仁堂、乐仁堂、继仁堂、乐舜记、宏达堂等在全国各地共有三十四家之多。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府迁都南京，人口骤增，当时同仁堂掌权乐佑申，见有利可图，乃令其弟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一切资金货物，概由同仁堂拨付，此举是违反族规的，因而被攻下台。后由乐松生的父亲乐达义出面负责。乐达义系德国留学生，曾在北京警察厅担任